



厦门大学  
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  
2011—2021

■ 中国新闻学建构丛书

# 早期中国新闻学的历史面相： 从知识史的路径

A History of 'Journalism for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istory of Knowledge

朱至刚 /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 中国新闻学建构丛书

# 早期中国新闻学的历史面相： 从知识史的路径

A History of 'Journalism for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istory of Knowledge

朱至刚 /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早期中国新闻学的历史面相:从知识史的路径/朱至刚著.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6. 7

(中国新闻学建构丛书)

ISBN 978-7-5615-6188-1

I. ①早… II. ①朱… III. ①新闻学史-研究-中国-近现代 IV. ①G21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66774 号

---

出版人 蒋东明

责任编辑 王鹭鹏

封面设计 李嘉彬

责任印制 朱 楷

---

出版发行 厦门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路

邮政编码 361008

总 编 办 0592-2182177 0592-2181406(传真)

营销中心 0592-2184458 0592-2181365

网 址 <http://www.xmupress.com>

邮 箱 [xmupress@126.com](mailto:xmupress@126.com)

印 刷 厦门集大印刷厂

---

开本 720mm×1000mm 1/16

印张 11

插页 3

字数 230 千字

印数 1~2 000 册

版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2.00 元

---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厦门大学出版社  
微信二维码



厦门大学出版社  
微博二维码

## 总 序

新闻传媒是现代社会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信息社会,新闻传媒是信息传播的主渠道,其作用日显重要。对新闻工作的重视,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就明确指出,每个地方组织均有权出版地方通报、日报、周刊、传单和通告。不论中央或地方出版的一切出版物,其出版工作均应受党员的领导。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对意识形态和新闻工作做出多次重要指示。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部分中央级媒体后,主持召开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语重心长地指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要适应国内外形势发展,从党的工作全局出发把握定位,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尊重新闻传播规律,创新方法手段,切实提高党的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和使命是“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澄清谬误、明辨是非,联接中外、沟通世界”。要承担起这个职责和使命,必须把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摆在第一位,牢牢坚持党性原则,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牢牢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牢牢坚持正面宣传为主。

探究新闻活动规律的新闻学,是现代学术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既是传承悠久的文明之邦,更是蒸蒸日上的崛起中大国,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都有很多的经验值得认真总结、提炼并上升为理论。中国人关注、思考和研究新闻学的重要问题已近百年。这些丰硕成果无疑值得重视和整理,历代新闻学人的治学自觉

的精神更是值得传承和发扬。正如习总书记在2016年5月17日举行的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指出的那样,我们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让世界知道发展中的中国、开放中的中国、为人类文明作做贡献的中国。

厦门大学是具有浓厚民族情怀的南方之强,中国人自创的第一个新闻专业在厦大诞生,因此,厦大在中国新闻学研究有所建树责无旁贷。这套“中国新闻学建构丛书”的作者以我院教师为主,集中展现其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初步成果。这些成果以中国为立场,探究中国新闻现象自身特征为对象。这一系列原创性研究成果将与“中国新闻学经典论著丛编”互为表里,共同展示我院为响应习总书记的号召所作的起步尝试。

在这部丛书出版之际,应当感谢福建省委宣传部的关心、指导和大力支持,感谢兄弟院校专家的参与、指导和支持。感谢厦大领导和厦大出版社的具体指导和帮助。可以说,没有以上这些方面的帮助和支持,仅靠我院的力量,难以取得现在的成果。在送上由衷感谢的同时,也期望得到上述有关方面一如既往的指导、支持和帮助。

张铭清

2016年5月25日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原院长)

## 前言

本书之中,“中国新闻学”多加引号,是为强调将其作为考察的对象。笔者试图在知识社会学的视域下,梳理和考察“中国新闻学”在被建构的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那些结构性的因素,揭示这些因素之间的互动关联,进而勾勒其间的演化图景。虽说这样的考察可能呈现历史的多维面相,但在具体的考察和书写中,却需面对三方面的困难,在三个维度上进行抉择。

首先,对象化的边界何在?在林林总总的既存文本中,究竟应该以哪些作为考察的文本?这本身就在拷问书写者是否意识到自身的立场与预设。在当下的学界,对于“中国新闻学”的历史,最常见的书写方法有以下两类。第一类是从最靠前的《新闻纸略讲》(1834年刊于《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说起,沿着物理时间一路讲下来,仿佛就是通史。依据后世追认的历史分期,对此进行断代式的描述,则可视为此类的变格。第二类则是根据后起的学科内部划分追溯过往。必须承认,依照前一种写法,中国新闻学会显得既由来有自又始终与时代同步,而后一种叙事更显明了专业理念的源远流长和与时俱进。然而追溯到书写的基调,这两种路径却又有共同的预设,就是将“中国新闻学”的当下面目不仅视作现实中的存在,更设定为逻辑上的必然。依据这样的预设,无论是对文本的选择解读,还是对其意义的判断,其实都是在论述——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描摹——何以会有这样的必然。

真要以历史为取向来观照,这样的“必然”是否当真就天经地义?自然,无论在知识还是理论的层面上,每门学科甚至科学都或多或少地依托于看似不言自明的预设。新闻学在中国更是从来都面临着多重的合法性考验,它既要证明自己足以被称为“学科”,更要彰显在“中国”情境下的必要。从这个意义上讲,着意地以“中国必然要有这样的新闻学”为主旨来书写“中国新闻学”的历史与演化,的确曾是这个学科的必然选择。正是因为作为学科的“中国新闻学”已相当稳固,我们才能在

前人的基础上思考是否可以从另外的路径来理解和诠释其缘起和流变。在这本小书里,笔者就试图这样尝试。因此,对于这两类既有的考察路径,即使并非刻意规避,也的确是着意要和它们有所不同,具体而言,就是试图将“中国新闻学”的流变更多地看作被建构的结果而非目的。

其次,是否必须勾勒出完整的图景。说到底,这体现着书写者对自身的评估。倘若在下笔之前,就已自认为对学科的当下构成瞭如指掌抑或对它的未来抱有明确的殷切期待,再依此回望,书写者就很可能底气十足。实际上,这样的视角跟欧洲传统中的史诗,或是中国意义上的诗史,在旨趣上实有几分相通。且不论这是否更像是寄托情怀,也不管究竟持有怎样的具体预设,依据这样的写法,基调愈为鲜明,观照也就愈发连贯清晰,呈现出来的文本当然会铺陈备至、架构宏大。而在这样因预设而追认正脉,又因正脉而展开叙事的框架下,书写者俨然对历史的真相与全貌如观掌中之纹,进而如月印万川一般娓娓道来。

如果仅侧重于阅读的乐趣,这样的文本读起来当然像禅宗的灯录或是前四史的名篇那样酣畅淋漓。但倘若对其中蕴含的预设并不抱有先验的认同,就不免会抱有这样的疑问,是否的确存在着一种既依据质料而具象展开,又不以物理科学为范本的框架,其本身就足以让我们从中获得足够的自信,能够据此去认知而非诠释所有与考查对象相关的因素与情景,而且从中提炼出来的“必然”足以包容所有相关的事件和存在?也许在任何的学科内部,这样的疑问不仅难以回答,甚至本身就毫无意义。如果不是对认识框架本身抱有绝对信任,又怎能有信心依此去呈现“整体的历史”抑或“历史的整体”,哪怕所研判的仿佛只是历史的分支或者片段?在这里,笔者坦率地承认自己不具有回答这个问题的能力。所以这本小书也就只能暂不考察“中国新闻学”整体演化图景,转而基于可获的材料,勉力了解具体的线索与观念。希望这样做去,多少能让某些“碎片”的面目较前稍微清晰。

最后,时间上是否要完全连续。倘若书写者从强劲的预设(甚至是信仰)中获得了对自身认知能力的充足信心,当然会着力呈现完整且连贯的演化图景。在这样的书写方式下,时间就是正统和主脉得以展开的依托。或者更确切地说,正是因为连接着早已注定的起始与终结,又为其间种种具象的降临提供必须依托,时间本身才被认为有意义。在这样的叙事框架下,图景的完整与时间的连续恰是一体之两面。缘此也就不难理解,任何谱系一旦被认定为卓越,就必然会在时间上被讲述得绵延连续,其实这也就是编年史以时间为经的本意。但如果用建构的眼光来审视观念的衍生流变,时间线的选定与续断本身就必须格外警惕。如非着意要将所

有事件(至少是被选取的事件)纳入同一个无所不包的框架,那么对物理时间的先后和事件之间的因果关联的判分就需要格外矜慎。体现在对观念的考察中,除非有非常直接的依据,不可轻易判定时代相近或是所论亦复形似的人物或论著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诚如本书正文中所要剖析的那样,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以“中国新闻学”为志业的学人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共同体,而是在共同的宏大主题下,各自尝试着搭建自认为科学的体系。而且,虽说对观念的探讨需结合历史情景,这已被视为公认的准则,在头绪多端的事件中,究竟有哪些以怎样的勾连起如何的影响?若是进行宏大的总体化叙述,被纳入“内史”的元素往往本身就为数众多,甚至框架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结构,但如非预设先存,研究者何以确信既毫无遗落,又未混杂进其实无关的变量,而且考察因素之间的结构关系更确如自己所构造?如果还要以此为基础,融汇同时期的社会格局与情势,进行“外史”维度的考量,真是从原则上说来容易,具体操作的难度却难以想象。对历史的考察,更绝无可能如自然科学那样,通过不断地设置与调整变量,从对多次“其他一切条件相同”结果的参照对比中,逐渐而有效地趋近于理论上应该存在的真实状态。然而,倘若研究中对个中难处心存敬畏,量力而行以单个的线索或观念为起点,尽可能地在材料充足的允许范围内,有依据地与相似之物进行对比勾联,反而有可能从它们自身的具体异同中找到能提炼的中层结构。

行文至此,笔者不揣冒昧,想谈谈自己对什么样的问题既是力所能及,又不至于只是望文生义的浅见。那就是考察的文本(或者文本群体)自身呈现出的架构本身就处于中观层面,既不至于因为太过宏大与复杂,乃至放置于历史情境中无处措手,也不至于过于简单,以致难以就其本身找到可资深入的切入点。落实到对“中国新闻学”的考察中,最理想的地方在于它们体现的现象既着实对后世的学科面目产生显著的影响,本身也成自洽的逻辑体系,而且其间的人物、事件、著述、观点,与同时段的历史情境,尤其是那些在此前通常不被认为是“新闻学”范围内的存在,还的确存在着历历可查的现实关联。这样的问题关联到“中国新闻学”的顶层设计,因而在学科内部颇具考察的价值。同时,它们又体现着同时段整个社会的运转与共识,对它们的认识之于认知历史情境本身亦不无裨益。可以说,以具体的观念和事件为起点,沿着这种由下而上的路径(如果在材料上可能的话),我们可以试图摸到对“新闻学”而言属于顶层,对于“中国”而言又属于内在架构组成部分的关联和分界。缘此而构造出来的问题和考察既是新闻学的,又不只是新闻学的。姑且不谈这样自甘碎片是否能对当下方兴未艾的传播学术史和思想史研究起到方法上的

助益。相对于总体化的宏大论述,对于各条具体线索的考察自然显得宛若碎片。但也许唯其如此,反而能够更加专注地梳理它们各自的缘起与流变。

基于这样的研究定位,本书在每个章节的讨论中不得不将同时期的其他趋势与因素,仿佛在微积分中求偏导那样,权且作为常数。这确实有几分画地为牢的味道,对历史的考察原本就是盲人摸象,只要触及的真是大象的躯体,又尽可能地沿着触点爬梳开去,也许确能识其小焉?毋庸讳言,能遇上建构出此类问题的机会,实在需要运气。这本小书所呈现的,也正是笔者自认为应当属于此类的一些尝试。回到“盲人摸象”这个隐喻,这本小书当然无法将大象的样子完备淋漓地深描出来,其实以笔者现下浅薄的学力,甚至还无从判断有无这样的可能,但也许的确勾勒出了其在生理上和功能上一些堪为独立的部位。这个判断距离事实到底有多遥远,尚望诸位高明不吝指点。当然,在“中国新闻学”的发展和流变中,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方面训练纯熟、信仰坚定的共产党人,毫无疑问做出最大的贡献。但以笔者现下的学养和学力尚不足以对此进行系统的把握,因此,这方面的探讨将在以后着力展现。

## 目 录

## 第一章 中国新闻学的前史

——从学问观的角度 ..... 1

第一节 “新闻学”在中国的早到与晚达:以“新闻”是否需“学”为中心 ..... 3

第二节 “中国新闻学”的速成:基于民初“学问观”的不变 ..... 16

## 第二章 作为复数的“中国新闻学”(上)

——经典的本来面目 ..... 29

第一节 以学淑世:“中国新闻学”的直接成因 ..... 31

第二节 各自的“中国新闻学”:基于对“吾国报业”的病理诊断 ..... 35

第三节 作为立场的“中国”:“中国报刊史”的书写缘起 ..... 46

## 第三章 作为复数的“中国新闻学”(下)

——被遗忘的“另类” ..... 57

第一节 宛委别藏:经典之外的早期新闻学 ..... 59

第二节 任白涛:一位新闻学人的现实际遇 ..... 70

## 第四章 中国新闻学的世代与规训

——以早期复旦大学新闻学系为例 ..... 83

第一节 作为“学术群体”的复旦大学新闻学系:侧重于谢六逸与黄天鹏 ..... 85

第二节 渐成规训的新闻学理:以学生课业为考察对象 ..... 100

## 第五章 新的中国新闻学

——基于对“新中国”的愿景 ..... 109

第一节 作为愿景的“新中国”和“未来的中国报业” ..... 111

第二节 战时新闻学:以“抗战建国”为依归 ..... 1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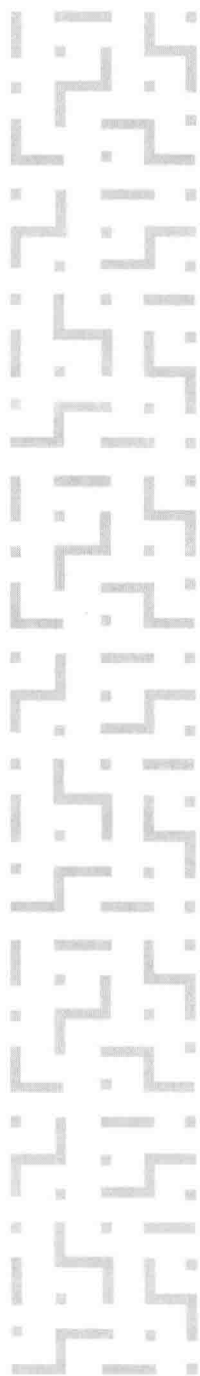
◆早期中国新闻学的历史面相:从知识史的路径

|                                    |     |
|------------------------------------|-----|
| 第三节  《科学的新闻学概论》:为战后的新中国而作 .....    | 122 |
| 第六章  作为观念的“同仁报”                    |     |
| ——以“同人办报”为参照 .....                 | 129 |
| 第一节  并不必要的概念 .....                 | 131 |
| 第二节  并不多余的观念 .....                 | 132 |
| 附录  问题与路径:1978—1981 年的新闻理论研究 ..... | 141 |
| 参考文献 .....                         | 161 |
| 后  记 .....                         | 167 |

## 第一章

# 中国新闻学的前史

——从学问观的角度



作为新名词,“新闻学(报学)”进入中文世界其实不晚。至迟在1901年,梁启超就刊于《清议报》的《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里提到“日本松本君平氏著《新闻学》一书,其颂报馆之功德”。1904年3月,《东方杂志》创刊号的新书广告中亦刊有“《新闻学》,松本君平,商务印书馆”一条。《万国公报》第180册所刊《报学专科之创立》也提到,“近日美国纽约世界报主人布列周拟捐出美金二百万元,特为报学专科立一学堂”,“布列周”自然就是普利策。且不论《清议报》在国内的流通是否顺畅,《万国公报》和《东方杂志》却都对中国的读书人有相当的影响。然而,有些令人不解,直到清民之交,无论自著,还是翻译,国人在“新闻学”上都没有多少作为。

## 第一节 “新闻学”在中国的早到与晚达： 以“新闻”是否需“学”为中心

黄天鹏在1929年是这样解释的：“有清光绪二十八年，商务印书馆刊行《新闻学》一书，为我国人知有新闻学之始。原书为日人松本君平所著，一名《新闻事业》。顾其时新闻纸尚在草创时期，新闻学自不为社会所重视，因兹弗能畅行遐迩，不久遂告绝版，然新闻学已肇其端矣。”<sup>①</sup>将斯学不兴解释为斯业不旺，乍看上去没有什么逻辑上的破绽。然而对照史实，却与当时知识界的情形大不相符。仅据顾夔光《译书经眼录》所录，1902—1904年国人自著新学书籍将近632种。按照后世的学科分类，其中非教材类的人文、社科著作情况可见下表1-1。

表 1-1 1903 年前国人自著非教材人文社科类新学书目情况

| 文学 | 外语 | 政法 | 经管 | 历史 | 国际关系 | 哲学 | 教育学 |
|----|----|----|----|----|------|----|-----|
| 15 | 18 | 38 | 16 | 53 | 22   | 12 | 35  |

顾夔光.译书经眼录卷八.本国人辑录书[M]//熊月之.晚清新学书目提要,上海:上海书店,2007:352—376。

试问当时中国的诸般近代事业，又有哪样被国人认为已上轨道？实际上，自甲午到民初，中国的读书人虽说依旧把儒学群经当作经国正典，却在尽全力地扩展他们的知识世界。而在当时的西方，“边际效用革命”刚刚兴起，即便是经济学对数理工具的运用也只在算术层面。对国人而言，要阅读和了解各门人文社科的论著、学说，要面对的仅是大致相仿的语言门槛<sup>②</sup>。那么，是否全如徐宝璜所说，即便到了1919年，新闻学在西方都还“亦无完善之书”，国人即便想要了解，也无从学起？<sup>③</sup>须知清末民初，中国学者对西学的翻译和吸纳，原本就有不少或如严复那样裁剪集

① 黄天鹏.新闻运动之回顾[M]//黄天鹏.新闻学名论集.上海:上海联合书店,1929:1.

② 豪伊.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M].晏智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③ 徐宝璜.自序[M]//徐宝璜.新闻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10.该版以1930年黄天鹏整理版为底本,主体内容与曾在《东方杂志》登载的《新闻学大意》并无明显差异。

纳,或像梁启超那样加入自己的价值判断<sup>①</sup>。仅从表 1-2 所列徐宝璜所著《新闻学》所引 99 种英文文献的面世年代,也能看出要在此前译介这门学科并非全无可依。

表 1-2 徐宝璜著《新闻学》所引英文文献的成书年代分布

| 1870 年以前 | 1871—1880 年 | 1881—1890 年 | 1891—1900 年 | 1901—1910 年 | 1911 年以后 | 不详 |
|----------|-------------|-------------|-------------|-------------|----------|----|
| 1        | 1           | 3           | 11          | 52          | 29       | 2  |

邓绍根,《中国新闻学的肇路蓝缕》,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 221—235,这里的统计,是基于邓绍根的相关考证。

由此亦可看出,早在 20 世纪初,虽说新闻学在美国尚未被整合并连缀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相关的专项研究(未必是以报纸、报人为研究取向)数量已相当可观。或许这也是密苏里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能接受、设立新闻学科的理由之一。而从甲午以前到 20 世纪 20 年代,在外的留学生始终是翻译、引入域外学术的主力,他们接触相关文献的机会应不为少。譬如 1913 年出版的《实际新闻学》中译本,不就出自主修工科的史青?从上述考察不难推想,1901—1918 年,对世界学术浸入益深的国人,并不缺乏接触新闻学的机会。

再者,依据“新闻纸盛则新闻学兴”的解释框架,也难以解释何以从 1919 年开始的短短几年间,新闻学在中国勃然而兴,中国的报业在此期间却并未突飞猛进。而且,若从体例和架构上审视那些在 20 世纪 20 年代接踵而来的著作,还不难发现其中的相当部分都试图构建从本体到现象,从理论到应用,完整而自洽的诠释体系。譬如徐宝璜在《新闻学》中就声称:“本书虽仍不完备,然对于新闻学之重要问题,则皆为有系统之说明;而讨论新闻纸之性质与其职务,及新闻之定义与其价值,自信所言,颇为西方学者所未言及者。”<sup>②</sup>且不论细部是否精致,就这些著述的总体和结构而言,它们作为“理论”似乎还走在欧美和日本学界的前面。如果将这些迹象仅仅按照时间顺序依次排开,“中国新闻学”的生成就俨然是桩奇迹,差不多是

<sup>①</sup> 罗选民,《意识形态与文学翻译——论梁启超的翻译实践》[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1):21—27。严复在翻译《天演论》等著述时,对原著有所增减,已近学界共识。还在 1905 年,王国维就有这样的评价:“七八年前,侯官严氏所译之赫胥黎《天演论》(赫氏原书名《进化论与伦理学》,译义不全)出,一新世人之耳目,比之佛典,其殆摄摩腾之《四十二章经》乎?”(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J],《教育世界》,1906(93):1—6)。《四十二章经》本身就是摄摩腾、竺法兰根据《法句经》的大意新造的摘录本。

<sup>②</sup> 徐宝璜,自序[M]//徐宝璜,《新闻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10。

目不暇接,从几近空白而迅速繁荣。当然,如果要着意渲染其间的正当性乃至优越性,完全可以就此着力书写列位先贤是如何识见超绝,才能取精用宏,创下“本学科”的祖业,还不妨顺带把自己也写入其中谱系,正如下文中剖析的那样,黄天鹏至晚从1930年代初开始,就很努力地在这样做。然而依据这样的写法,时间线也好,社会情境也罢,纵使谈得琳琅满目,也不过就是在为这种预设背书。但如果并不是在验前就坚信“中国新闻学”注定就会降临,乃至必定会以这样的面目出现和流传,那就必须追问,到底是哪些因素的演化和交互才结构性地造就了“新闻学”在中国以这样的轨迹来落地和流变。自然,要这样来研判,首先就得回答“中国新闻学”在整体上是如何,又因何才从无到有,至于其间的各部论著在逻辑上是否自洽,彼此在源流上是否相关,这些追问只能暂且悬置。毋庸讳言,这就是要先为“中国新闻学”寻到“外史”意义上的起点,好在以它为主而非对象,看似“内史”的论著早已层出不穷。

实际上,从上列两表不难发现“新学”和“西学”在其原生国度的成熟度和被近代中国接纳的程度并不存在明显的正相关。此时国人的知识观更多是被对时局的认知所形塑,他们往往并非基于对知识的把握,而去认定何等论述是否足以称为“学科”(discipline)乃至“科学”(science),而是先依据对当下所需的认知,判定何等“学问”(learning)确有可取。更确切地说,是认定为当下的中国所必取,才去按图索骥,填充相应的知识,甚至缘此构建知识和学科的谱系。从这个意义上讲,晚清学界对“新学”“西学”的引入和对墨学、唯识、公羊学的重拾,对“泰西”近事的选择性解读和对三代、金元、“国朝”历史的再认识,看似古今中外迥然有异,但接纳的心态和寄托的期待却是脉脉相通。当然,即便对“学问”抱有同样的希冀,出于世代、地位、知识背景的差异,对知识图景的想象也不尽相同。在现实的社会规则下,怎样的图景想象能更影响群体的共识,或是被固化为学术规制,和所持者既有的地位与影响力自然密切相关。譬如光绪二十九年(1904)颁布的“癸卯学制”,虽说是以日本学制为蓝本,却将“经学”和“政法”从文科、商科中单列出来,并将经学科大学列为诸科大学之首,而在八科下设的四十六个学门中并无“哲学门”<sup>①</sup>。在此时已对西学颇有造诣的王国维看来,这样的架构存在根本的缺陷,“其根本之误何在?曰在缺哲学一科而已”,他还认为其原因就在主持该事的张之洞,“尚书之志则善

<sup>①</sup> 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340.

矣,然所以图国家学术之发达者,则固有所未尽焉”,必以“哲学为有害之学”“哲学为无用之学”“外国之哲学与中国古来之学术不相容也”<sup>①</sup>。虽说此番议论,足以代表世纪之初新世代学人的共识,但在当时对学制的拟定几乎未发生任何影响。北京大学直到1914年才改经学科为哲学门,而且在1917年以前,师资阵容、课程设置、学术倾向,大体上仍延续着此前的路数,与王国维当初的期待相去仍远。大致梳理了在近代中国,什么知识、门类是否能算“学问”,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否能被确定为在当下专门研习的“学门”,更多的是出于知识界(尤其是上层精英)对时局的判断,再来观照清末民初的报刊观念,就不难看到,虽说国人对报刊之于国族的作用愈发看重,却尚未认定需得查考其自身的运作规律和演化历程。

国门开放后,国人本不乏阅报经历,对“泰西”报业也非无所知。然而在甲午战败以前,他们却并未就中国亦需办报,尤其是以西方国家为典范办报形成共识。<sup>②</sup>王韬和郑观应常被视为倡导国人办报的先驱,且不论这两人在当时的士林中均非核心人物,他们此时的相关主张其实相当审慎。王韬1874年发表的文章《论日报渐行于中土》,大半篇幅谈外人在华办报的历史。他虽说承认“如英国之泰晤士,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但却归因于“西国之为日报主笔者,必精其选,非绝伦超群者,不得预其列”,而非认为报刊作为媒介本身就可能具有广泛的影响力<sup>③</sup>。也正是基于这一标准,他对中国已有报刊的评价并不高,“其间(秉笔之人)或非通材,未免识小而遗大”,“至于采访失实,记载多夸,此亦近时日报之通弊,或并有之,均不得免”<sup>④</sup>。再如郑观应,在《日报上》中转述“泰西各国”的各级政府“悉听报馆照录照报”<sup>⑤</sup>,甚至认可“欲通之达之,则莫如广设日报矣”,落实到当下,却只建议“今宜于沿海各省,次第仿行,概用华人秉

① 王国维.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J].东方杂志,1906,3(6):109—117.

② 黄旦.也论林则徐的新闻观:兼论中国近代新闻思想之源头[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5):68—73.

③ 王韬.论日报渐行于中土[M]//王韬.弢园文录外编.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299.

④ 王韬.论日报渐行于中土[M]//王韬.弢园文录外编.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301.

⑤ 郑观应.日报上[M]//郑观应.盛世危言.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75.